

中文版前言

根据联合国“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战略，世界银行于2000年编写并出版了政策研究报告《Engendering Development》，同时出版了该报告的摘要。这份报告已受到一些国家的欢迎，对在全球社会发展中推进性别平等、促进性别主流化具有积极的意义，该报告的摘要已被一些国家翻译成本国文字并出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中国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和一贯坚持男女平等的大国，在社会性别主流化方面应做出表率，因此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合作，翻译出版了该报告的摘要，旨在推进性别平等主流化和执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进程。

感谢世界银行对本报告摘要翻译、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同文翻译公司的辛勤工作！同时欢迎各位读者对本摘要给予指正。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2001年6月

致读者

这本册子是《在发展中促进社会性别意识——通过提高权利、资源和言论的社会性别平等》一书的摘要，也包括了该书的目录。

报告全文将由世界银行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如需订购，请填写手册后附的表格。

欲进一步了解有关本报告的信息，或获取有关《工作论丛》，请访问：

www.worldbank.org/gender/prt.

政策研究报告制定小组

政策研究报告由伊丽莎白·金 (Elizabeth M. King) 和安德鲁·麦森 (Andrew D. Mason) 执笔，艾南亚·巴苏 (Ananya Basu)、泰卢坦 (Tai Lui Tan)、克劳迪亚·蒙特尼格罗 (Claudio E. Montenegro) 和王丽红 (Lihong Wang) 负责编辑和分析数据、绘制图表、撰写说明文字和附录内容，并且开展背景调查。布兰克·约万诺维奇 (Branko Jovanovic)、克里斯蒂娜·埃斯特拉达 (Cristina Estrada) 和欧文·哈盖 (Owen Haaga) 提供了其它研究帮助。报告的撰写工作由凯伦·迈森 (Karen O. Mason) 和林·斯夸尔 (Lyn Squire) 共同指导。

行政支持小组由简·斯维尼 (Jane Sweeney) 和安娜·玛丽·玛拉农 (Anna Marie Marañon) 领导，得到了伯利·明斯 (Polly Means)、道恩·巴兰泰恩 (Dawn Ballantyne)、以及发展研究小组和社会性别发展小组内部若干成员的协助和支持。其中，苏珊·拉扎兹 (Susan Razzaz) 协助了对政策研究报告草案展开的讨论，芝田世代子 (Kayoko Shibata) 和赵青华 (Qinghua Zhao) 给予了技术支持，莉莉安娜·朗戈 (Liliana Longo) 和帕特里西亚·赛德尔 (Patricia Sader) 在预算及合同的监督方面也提供了慷慨的援助。布鲁斯·罗斯-莱尔森 (Bruce Ross-Larson)、梅塔·德·克奎雷蒙特 (Meta de Coquereaumont)、莫里·罗曼 (Molly Lohman) 以及通讯发展公司的艾里森·史密斯 (Allison Smith) 对报告章节进行了编纂。报告的研究、设计、编辑、出版和发行由世界银行出版司统一领导和管理。

摘要

在世界范围内，社会性别歧视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近几十年来，社会性别平等虽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这种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改观。各国和各地区社会性别歧视在性质和范围上虽大相径庭，但其种类却都让人触目惊心。在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里，女性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与男性平等地享受法律、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利。在资源的享有和利用、经济机会、权利和政治舆论等方面，社会两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妇女和女童是这种不平等的直接牺牲品。但这种牺牲广泛波及全社会，最终损害到每一个人。

鉴于上述原因，社会性别平等成为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其本身也成为发展的一个目标。它可以增强国家发展实力，减少贫困，提高管理效益。因此，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成为使包括男女两性在内的全人类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发展为最终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提供了诸多途径。全球大量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结论。但是发展本身并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同时还需要制度保障为男女提供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并制定政策和措施来纠正始终存在的平等问题。这项报告讨论了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三步战略。

- *改革制度，为男女建立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为实现权利和机会的社会性别平等，有必要改革法律和经济制度。鉴于很多国家的法律仍然体现了不平等的男女权利，因此需要进行法律改革，特别是进行《婚姻法》改革，反对家庭暴力，保障土地权、就业权和政治权。

- *加强经济发展以鼓励资源共享和平等参与意识。*

收入的提高和贫困的缓解减少了教育、卫生、营养方面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生产力的提高和新的就业机会常常使社会性别就业形势得以改观。水、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上的投资同样减少了社会性别在工作负荷上的不平等。

- *采取积极措施以纠正持续存在于资源支配和政治言论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

因为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未必能充分或立竿见影地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问
题，因此仍需要在短期到中期采取积极的措施。

权利、资源和言论方面的社会性别平等

社会性别指的是社会形成的两性分工、社会习得的行为模式以及对两性分别寄予的期
望。男女在生理上有所不同，但所有文化都将这些内在的生理差异解释和发展成为一
系列社会期望，主要是关于哪些是适当的行为和活动，哪些是两性所具有的权利、资
源和权力。在不同社会，这些期望有很大差异，但也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例
如，几乎所有的社会都认为照顾幼儿和儿童是妇女和女童的主要责任，而男人的责任
则是服兵役，保家卫国。

像种族、民族和阶级一样，社会性别也是一个社会范畴。它大致奠定一个人在生活中
的机遇，影响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参与。尽管一些社会没有种族或民族划分，可是所有
社会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社会性别上的不对称——差异和不平等。虽然这些不对称的变
化速度通常是缓慢的，但却远远不是静止的。事实上，有些时候，它们在一定的政策
和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

“社会性别平等”一词在社会不同发展状况下有多种定义。政策研究报告将“社会性
别平等”定义为法律规定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包括平等获得劳动报酬和平等使用人力
资源以及其它提供机会的生产性资源）和言论的平等（指能够影响和促进发展进程）。

“社会性别平等”一词在报告中尚未被定义为收入的平等，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
的社会和文化在寻求社会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二是平等意味着男女
依据个人喜好和目的享有选择不同（或相同）工作和收入的自由。

政策研究报告采用各种形式的数据和分析方法讨论有关跨越发展中世界社会性别不平
等的问题。但是从多方面衡量和评定社会性别不平等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而且
在社会性别平等的若干重要方面缺乏针对两性分门别类的数据和分析也的确是一个障
碍。与相对落后的国家相比，发达国家能够占有更为丰富的经验性证据，因此，报
告也回顾了工业化国家的心得。报告从微观角度、国家层面和跨国家层面进行了综
合分析，并根据几条社会科学法则对实际工作加以了审核。

虽有进展，但社会性别不平等仍在各国存在

二十世纪后半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女性的绝对地位和社会性别平等都取得了巨大进步。

- 除个别情况外，女性教育水平取得了显著提高。在南亚、非洲次撒哈拉地区、中东以及北非，女童的小学入学率翻了一番，比男童入学率的上升速度还要快。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两性在学校教育上存在的鸿沟。
- 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寿命提高了15到20岁。随着对不同年龄女童和女性投入的增加和对医疗保障的更充分利用，在所有发展中地区出现了对两性寿命预计的生物模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亚女性人均寿命首次高于男性。
- 更多女性成为劳动力。从1970年起，东亚和拉丁美洲女性的就业率平均上升了15个百分点，高于男性就业率的增长速度，从而减少了两性在就业问题上的差距。工资上的社会性别差距也相应得以缩小。

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各发展中国家在权利、资源和言论方面仍然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很多地区，进展的速度缓慢，参差不齐。除此之外，一些国家社会经济的波动导致种种挫折，危及到经艰苦奋斗才取得的成果。

权利

没有一个地区的男性和女性能够拥有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权利（图1）。在相当一部分国家里，妇女没有独立占有土地、管理财产、开展贸易的权利，甚至没有丈夫的同意就不能出游。在非洲亚撒哈拉大部分地区，妇女主要是在婚姻维系的前提下，通过丈夫获得土地权，一旦离婚或丧偶，她们就常常失去这些权利。权利上的社会性别不平等使妇女在生活很多方面原本能够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受到束缚——这通常大大限制了她们参与发展的能力或从中受惠。

图1 基本权利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在所有地区始终存在

社会性别平等指数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东欧和中亚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中东和北非	南亚	非洲次撒哈拉地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	----------	-------	----	----------	-----------

注：数值1显示了权利方面社会性别平等的最低水准，数值4显示了最高水准（详见概论结尾注释1）。

来源：Humana (1992)权利数据；世界银行人口数据(1999d)。

资源

女性对教育、土地、信息、财政资源等生产性资源的支配在整体上一直比较薄弱。在南亚，妇女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年限只是男子的一半，而女童在中学的入学率只占男童的三分之二。很多妇女不能拥有土地，即使具有拥有权的妇女，一般来说，也只能拥有很少的土地。在很多发展中地区，女性开办的企业相对男性来说往往资金不足，对机械、化肥、外部信息及贷款的使用权较小。这些在教育和其它生产性资源中的不平等影响了妇女参与发展以及协助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能力，并在老龄阶段和经济波动时转化为使个人或家庭面临危机的更大危险性和受伤害的可能性。

近年来，女性在受教育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在具有同样教育和工作年限的情况下，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仍然比男性少。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只能从事有限的几个固定的职业，并基本上与正式部门中的管理职位无缘。工业国家的妇女，其收入平均是男子的77%，发展中国家是73%，而只有5%的工资差距可以通过教育、工作经验或工作性质中的社会性别差异解释。

言论

不管是自办企业还是受雇于人，妇女对资源的使用有限，赚取收入的能力较弱，这都束缚了她们在家庭中影响资源分配和投资决定的权力。相对男性而言，女性的不平等权利和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样限制了她们对所在社区和国家决策的影响力。在国家和地区议会中，妇女代表人数严重不足，在国会中只占有平均不到10%的席位（除东亚以外，其百分点是18-19%）。在所有发展中地区，部委职位上的女性人数均未达到8%。不仅如此，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大多数地区没有取得显著的进步。东欧自经济和政治转

型过程开始以来，女性代表人数比例就从25%下降至7%。

贫穷人口中社会性别差异趋于最大

教育和卫生方面的社会性别差异在贫穷人口中往往最大。最近对41个国家青少年的入学人数研究显示，一般来说，国家范围内，贫穷人口入学率的社会性别差异比非贫穷人口要高（如图2）。5岁以下的婴幼儿死亡率在贫穷人口与非贫穷人口之间也有同样显示。

图2 社会性别差异在贫穷人口中相对较大
穷人中男女入学比率

富人中男女入学比率

注：入学率涉及6-14岁在校儿童的比例，不考虑入学水平。贫困家庭被定义为“财富”分配底层40%的家庭；富裕家庭指从高往底20%的家庭。45度斜线指贫富间相等的社会性别差距。

资料来源：Filmer 1999。

同样的模式也出现于贫富国家的比照。近30年来，在当今的低收入国家，社会性别平等在教育与卫生领域取得了另人瞩目的进步，但在这些国家，男女入学差异仍然比中、高收入国家要严重（图3）。尽管社会性别平等与经济发展有一定联系，但妇女在国会中所占席位仍然很少。中国和乌干达等一些低收入国家作了很大努力，向妇女开放全国代表大会席位，使妇女代表人数超出高收入国家，显示了社会强制对于社会性别平等的潜在作用。

图3 社会性别平等在低、中收入国家逐渐取得进步——政治参与除外

女性对男性比率

低收入国家

中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注：总入学率指的是特定学年中按照学校级别总入学人数占官方学龄人数的百分比，年龄因素不考虑在内。男女入学比例指女性入学总人数除以男性入学总人数的结果。国会代表指男女所占席位的比率。所有数值都是人口加权数值。

a. 国会数据从1975年起。

b. 国会数据从1985年起。

c. 人口寿命数据从1997年起。

来源：WISTAT (1998)国会数据；世界银行(1999d)收入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数只不过是关于社会性别平等的一些可衡量的标志物。为了更好地了解已经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差距，还需要包括从实物和金融资产的控制到自主权以

及其它方面的系统信息。

社会性别不平等危及大众福祉，阻碍社会发展

社会性别不平等迫使男人、女人和儿童为健康和幸福付出昂贵的代价，并影响其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除了人们自身的代价以外，社会性别不平等还降低了农业及企业的生产力，从而影响到减少贫困，保障经济发展的前景。此外，社会性别不平等还削弱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因此影响到发展政策的效力。

福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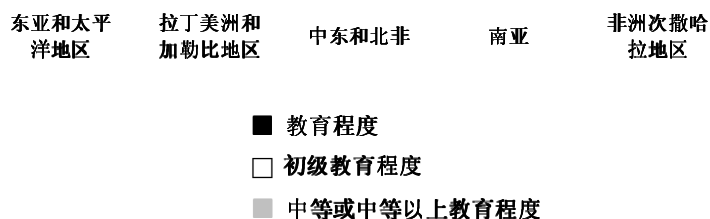
人们为社会性别不平等付出的最大代价是他们的生命和生活质量。全方位确定和衡量这些代价比较困难——但是世界各国的大量证据显示，顽固存在大规模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要遭受更为严重的贫困、营养失调、疾病以及其它损失。

- 中国、韩国和南亚的女婴死亡率极高。为什么？偏好男孩的社会传统导致儿童的死亡率中女童高于男童。一些评估显示，迄今已有6千万到1亿的女性死于社会性别歧视。
- 母亲没有文化和缺少学校教育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缺乏教育导致对孩子抚养质量低、婴幼儿死亡率高及营养不良。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更容易采取合适的促进健康的行为方式，例如让孩子接种疫苗（图4）。为了证明这些结论，对各家各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解释了其它促进婴幼儿养护及健康的因素。

图4 儿童免疫率与母亲教育程度提高成正比

12-23个月接受免疫的儿童与母亲教育水平的比照

百分比



注：所有地区的数值都是人口加权平均值。

来源：最新《人口与健康调查》中的免疫数据；世界银行(1999d)人口数据。

- 更高的家庭收入不仅与母亲的学校教育相辅相成，还与孩子更高的存活率和更好的营养密切相关。孟加拉国、巴西和科特迪瓦的研究显示，妇女掌管家庭的额外收入比男子掌管要产生更为积极的效果。但不幸的是，刻板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给予妇女有限的劳动报酬，限制了妇女争取更高收入的能力。
- 学校教育和城市工作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加速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图5）。艾滋病在下个世纪会传播得更快，直到四分之一妇女和五分之一男子被感染。这种情况已经在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几个国家发现。

图5 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与社会性别文化程度差异成正比

城市成年人艾滋病病毒蔓延率（计算尺）

男女文化普及率差距（百分点）

注：图块包含72个国家（32个属非洲次撒哈拉地区，20个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5个属亚洲，4个属中东，1个属工业化国家）。衡量感染艾滋病病毒城市人口百分比的竖轴已经转换成计算尺。各图块中的点表示不考虑回归分析中社会变量作用的情况下单一国家的数据（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收入不平等指数、宗教、国外出生人口比例）。

来源：Over 1998。

- 不同年龄阶层的女性，特别是贫困女性，常常要忍受社会性别差异的冲击，而男子也不得不为社会性别模式和规范付出代价。近年来，在东欧经济过渡时期，男子的寿命呈绝对下降趋势。男子死亡率的升高——和平时期记载的最高值——与急剧恶化的失业状况引起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和焦虑紧密相关。

生产力与经济增长

人类生活的代价是发展的代价——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性别不平等同时也要求生产力、效率和经济发展付出代价。由于阻碍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的积累，并系统地排除两性对资源、公用事业和生产性活动的利用，社会性别歧视降低了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经济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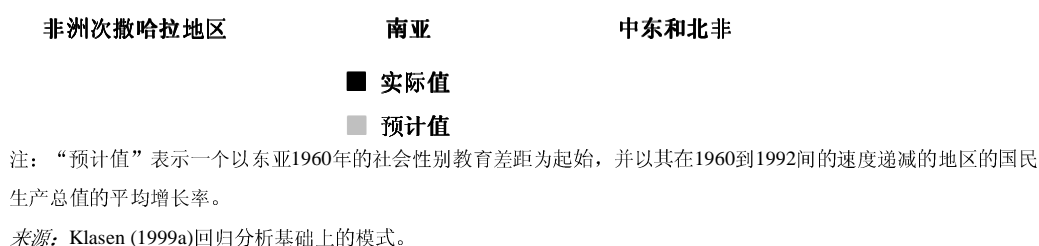
- 家庭中男女生产性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导致收入的减少。在布基纳法索、喀麦隆、肯尼亚等国家的家庭中，男女对投入和农业收入的平等支配能够使农作物产量增加现有产量的五分之一。

- 对妇女教育投资不足同样能够减少国家收入的总水平。一项研究估计，如果南亚、非洲次撒哈拉地区、中东和北非的国家中最初的社会性别平均教育年限的差距是东亚1960年的水平，并以东亚在1960到1992年之间所取得的速度减少这一差距的话，他们的人均收入就会以每年0.5到0.9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在实际增长率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图6）。另一项研究估计，即使是在以较高教育水准起步的中、高收入国家，妇女接受中等教育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就会相应提高三个百分点。两项研究均考虑到有关经济发展文献中的其它变量。

图6 加快缩小学校教育的社会性别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1960–92年

百分比



管理

妇女权利的提高、男女对公共事务的更广泛参与跟更加廉洁的商业、政府及更有效的管理相辅相成。妇女对公共事务的影响越大，腐败程度就越低。这一点甚至适用于拥有同等收入水平（图7）、公民自由、教育程度及法律制度的国家。这些结论尽管只是建设性的，但它们仍为妇女就业和参与政治提供了额外的支持——因为妇女是促进法制和有效管理的强大力量。

图7 增加平等权利能够减少腐败

腐败指数

妇女经济和社会权利指数

注：腐败指数采用《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中的数据，并将其转换成公式：腐败指数=10- (ICRG 指数 -1) × 2。妇女权利变量是Purdue大学全球研究项目制定的“妇女经济和社会人权 (WESHR) 指标”。数据也把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考虑在内。

来源：世界银行职员评估以及Kaufmann(1998)。

商界妇女向政府官员行贿的可能性比较小，大概是因为她们有较高的伦理行为标准或对

冒险更加反感。对格鲁吉亚共和国350个公司的研究显示，男子掌管或经营的公司给予政府官员的非官方报酬较女性的公司高出10%。无论公司的性质，如行业特点、公司规模等，或所有人和管理人员自身的特点，诸如教育程度如何，这一结论都同样适用。不考虑这些因素的话，男性经营的公司行贿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

社会性别不平等为什么会持续存在？

如果社会性别不平等危害人们的福祉和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那么为什么它还会在很多国家持续存在？为什么有些社会性别不平等较之其它更难根除？例如，卫生和学校教育等方面取得的进步很快，但政治参与以及平等享有财产权方面的进步却比较缓慢。在转换社会性别关系和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道路上，哪些是阻碍因素呢？制度、家庭和经济。

社会制度——社会模式、风俗习惯、权利、法律——以及经济制度，例如市场，塑造男女分工及相互关系，并影响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从事的活动、参加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方式。制度也体现了激发或阻碍偏见的因素，甚至当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不能明确区分两性时，社会模式也可就适当的社会性别分工做出明示或暗示。这些社会制度自身存在惰性，变革的难度大，进程慢，——但远非是静止的。

像制度一样，家庭对于塑造生活开始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将这种关系沿袭至下一代起着根本作用。生活当中的很多基本决定都是在家庭中做出的——有关生育下一代、工作娱乐及对未来投资，儿女之间任务和生产性资源如何分配，应该给予他们多少自主权，是否应该寄予他们不同的期望——所有这些造成、加强或减轻了社会性别不平等。但是家家户户并不是在真空中做出决定，而是以社区为背景，其采取的方式反映出更广泛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建立的诱因的影响。

因为经济决定了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许多机会，所以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在影响社会性别不平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较高收入意味着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受到较少束缚，父母也就不必被迫在男孩或女孩投资的问题上进行选择。但是经济发展对两性影响的精确衡量，还取决于能够进行哪些增加收入的活动，如何组织，如何回报付出的劳动和技能，两性是否能够平等参与。

事实上，看似在社会性别方面中立的发展政策却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一部分是因为制度和家庭决定共同塑造社会性别分工和相互关系的方式。家庭内部的社会性别分工以及社会模式和偏见、不平等的地位和资产使两性不能平等利用经济机遇——或平等应付风险或经济危机。从公正和效率两方面来看，制定政策时如果不能认识到由于区分社会性别带来的束缚，就会影响政策力度。

所以社会制度、家庭和宏观经济从社会性别角度共同决定着人们的机会和生活前景。三者也成为公共政策能否解决持续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关键。

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三项战略

社会性别不平等迫使人们付出昂贵的代价并制约国家的发展前景，因此急需采取公共和个人举措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国家的关键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提高两性的生活状况，并通过这种方法在另一方面争取与提高各年龄阶层妇女绝对和相对地位有关的实质性社会利益。公共举措尤为重要，因为使社会性别不平等长期存在的社会和法律制度即使能为个人所改变，也存在很大难度。市场运作不得力，意味着不能充分说明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力状况（因为妇女花费更多工作时间从事非市场活动，或因为劳动力市场缺乏或落后），并成为十分明显的障碍。

提高社会制度的效力和实现经济增长已经被广泛认为是长期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但是战略的成功实施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性别平等，为此，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还需要致力于长期存在的权利、资源及言论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此外，积极的政策和规划还需要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为此，应该采取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三部分战略。

1. 改革制度，为两性建立平等的权利和机遇

社会、法律和经济制度影响两性的资源利用、机遇及相对权力，因此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关键因素是为两性建立制度公平的“赛场”。

保障基本权利平等。权利的社会性别平等本身是发展的重要目的。法律、社会和经济权利为两性能够有效地参与社会、实现基本生活品质及利用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提供了理想的环境。权利的社会性别平等与更广泛的教育、卫生以及政治参与的社会性别平等一直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不考虑收入的影响（图8）。

图8 权利的平等与资源和言论的平等互相促进

女性对男性比率

中学入学状况，1995年		国会代表状况，1995年	
权利平等最低水准	权利平等最高水准	权利平等最低水准	权利平等最高水准

注：总入学率是在忽略年龄的情况下，校级总入学人数占官方学龄人数的百分比。女生对男生入学比率由女性入学总人数除以男性入学总人数而得。国会代表比例是由女性所占席位除以男性所占席位而得。平均值2.33或2.33以下表示权利平等的最低水准，最高水准是2.67或2.67以上（权利指数的其它细节来源概论结尾注释1）。

来源：Humana (1992)权利平等数据；WISTAT (1998)国会数据；世界银行(1999d)人口数据。

如果南亚、非洲次撒哈拉地区、中东和北非的国家能达到各自地区“最公平”国家权利的社会性别平等的水平，那么在中东和北非的国会中，妇女较男子的比率将会成为原来的两倍以上，其它两个地区也会提高60%以上。尽管提高权利的社会性别平等能够对教育的社会性别平等产生更多适度的影响（保守地讲），但是权利的大幅度提高却有可能在实现男童和女童的入学平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只有在南亚还会发现在权利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仍存在相当大的社会性别入学差距的现象。因此法律应发挥给予两性平等权利和保护的关键作用。

但是仅有法制改革还远远不够。很多发展中国家实施法律改革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多重——且不协调的——法律制度使问题更为复杂化。例如，乌干达的《民法》规定了离婚的平等权利，但是夫妻共有财产仍然按照惯例划分，离婚的妇女不能保留对土地的使用权。一些国家在处理性别暴力问题上，繁冗的证据要求以及其它程序上的障碍（以及执法者的态度）妨碍了司法公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别基本权利平等，努力加大国家司法和行政机构的办事效力就变得尤为关键。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政治领导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实行经济刺激，抵制社会性别歧视。经济制度的结构同样以十分重要的方式作用于社会性别平等。市场体现了影响工作、储蓄、投资、消费等的举措和决定的一系列有力的刺激条件。两性的相对工资、生产性资产的利润、物价和服务价格大多由市场结构决定。墨西哥和美国的证据显示，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运作的公司在雇佣和酬劳妇女时社

会性别歧视小于那些在受政府保护的環境下有显著市场力的公司。同样，中国的城乡地区，妇女在由行政分配的工作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比在从竞争渠道得到的工作中受到的要大。

更广泛地讲，深化市场以及消除信息利用领域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政策和投资——加上对性别歧视者的处罚——都有助于强化形成劳动力市场社会性别平等的动力。例如，在中国和越南，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深化带来了非农业企业中对女性劳动力要求的显著提高，从而为女性提供了新的就业和收入机会。

建构便民公用事业，促进平等使用。建构便民公用事业——如学校、保健中心、金融组织及农业外延项目——可以促进男女的公平使用。除此之外，将社区纳入便民公用事业的建构有助于解决地方的具体需要，常常对女性的享有和使用产生积极影响。

例如，孟加拉、肯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在校女生对学校质量和具体公用事业的特点较男生更为敏感——如在校的女教师、男女分离的学校和设施以及来往于学校的交通安全等。处理好这些因素可以显著提高父母对教育女儿的要求。在西非部分地区的“移动银行家”（在加纳又称为“*susu*筹款人”）向地方市场、单位和家庭提供金融服务，使妇女不必再为存钱或取钱而长途跋涉。在孟加拉，以小组为基础的贷款项目为保证款项偿还，采取协作小组和同辈压力的方法，取代了传统的银行担保。

2. 加快经济发展，增强进一步平等利用资源和平等参与的动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发展通过若干渠道改善各年龄阶层女性的状况，提高社会性别平等。

- 家庭有时根据价格水平和其它市场信号决定工作、消费及投资。这些信号的变动导致资源的再分配。经济发展在提高诸如卫生所和学校等公用事业的便利性和质量的同时，降低了家庭人力资源投资的成本。按证据所示，就成本降低幅度而言，如果女性高于男性，或对女性投资较男性对价格变化更敏感的话，那么女性将成为更大的受惠者。
- 在经济发展提高收入、减轻贫困的同时，社会性别不平等也随之减缓。因为低收

入家庭要被迫权衡在教育、医疗、营养上的投入而使女性承担大部分代价，这样收入的提高会使人力资源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相应下降。

和在基本权利方面的情形一样，收入的提高通常转化为卫生和教育等资源方面社会性别平等的进步（图9）。教育方面的模拟研究显示，收入增长带来的显著提高有可能出现在最贫穷地区：南亚和非洲次撒哈拉地区。不仅如此，收入在中等阶层的影响尤其突出。但模拟分析还显示，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拿经济合作组织的平均水平来说——应该在这些地区的中学实现或基本实现社会性别平等。这些增长在中、远期还不大可能。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对于国会代表的社会性别平等取得显著进步也是十分必要的。

图9 收入提高促进教育的社会性别平等

中学入学状况，1995年

女性对男性比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尺）

注：总入学率指在忽略年龄因素的情况下，特定学年校级总入学人数占官方学龄人数的百分比。男女入学比率由女性入学总人数除以男性入学总人数所得。

来源：世界银行（1999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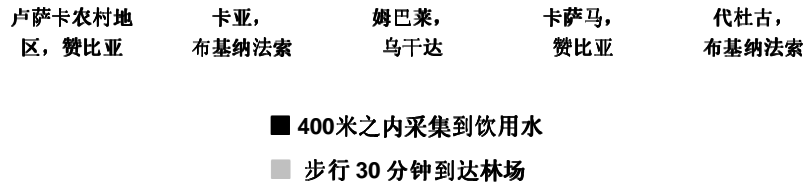
- 经济发展在扩大工作机会的同时，提高了对人力资源的预期回报率，刺激了家庭对女童的卫生和教育进行投资，鼓励了妇女就业。经济发展通过改变工作动力影响社会性别平等。
- 经济发展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的状况。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创造或增强了关于劳动力回报的市场信号，也使得经济上的一些低效现象得以消除。例如，不管是从事农活、料理家务还是照顾家人，在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地方，雇佣劳力都代替了女性家庭劳力。这使得家庭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并有可能减轻妇女的工作量。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或不完善，这种代替都是不可能的。
- 经济增长尤其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同步——以安全利用水、道路、交通及燃料，同时也有可能减少妇女和女童用于料理家务、照顾家人的时间。例如，在布基纳法索、乌干达和赞比亚，如果女性步行取用燃料和饮用水的时间能够减少到30分钟或更少（图10），那么每年就可以节省出上百个小时。经济基础结构的发

展能够大大减少女性用于家务杂事上的时间，从而为她们改善健康状况、获取更多的收入以及促进女童的学业提供潜在的有利因素。

图10 对水及燃料基础结构的投资能大大减少采集时间

每家每年平均可能节省的时间

小时数



注：卡萨马和代杜古已经实现了在400米之内采集到引用水的目标。在亚撒哈拉的部分地区，妇女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干家务时间都用于采集水和燃料，而孩子们，特别是女童则占用了另外5—28%的时间。

来源：Barwell 1996。

虽然经济发展可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但是其影响却既非充分也非立竿见影，且不是自发进行的。经济进步对于社会性别平等的作用主要依赖于权利状况、对生产性资源的利用和支配（例如，土地和银行贷款）以及政治言论。如过渡经济国家、东亚高速进步国家及拉美和非洲次撒哈拉地区国家取得的经验所示，抵制劳动力市场社会性别歧视，支持儿童保育的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本身在减缓社会性别不平等方面的不足进行了补充。识别以市场为基础的工作、家务劳动和风险中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保护政策对于女性（和男性）免受经济波动或持续的经济萧条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

近来关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争论认为以发展为方向的方法较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或政策上的方法更有效。但是证据显示，经济发展及制度改革都是促进社会性别平等长期战略中的关键因素。例如，在人均收入及社会性别权利平等落后的地方，增加两者之一都能提高教育水平的社会性别平等。两者兼顾甚至能够获益更大（图11）。

图11 权利的社会性别平等和收入增长促进多方面的社会性别平等——从教育到政治代表女性对男性比率

中学入学状况

国会代表状况

注：数据以多种回归分析中得出的模式为基础，包括收入及权利因素。平均数2.33或更少表示权利平等最低水准，平

均数2.67或更高表示最高水准（关于权利指数，来源概论结尾注释1）。高、低收入国家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中值分类。所有数值都是针对各项的人口加权平均值。

来源：Humana (1992)权利数据；WISTAT (1998)国会数据；其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1999d)。

强化基本权利的制度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可以相互促进。在非洲次撒哈拉地区，建立妇女的土地权可以提高妇女管理的地块产量——提高妇女及家庭的收入。同样，方便对储蓄及贷款的使用能够提高她们的经济地位，改善安全状况，增加家庭福利。在孟加拉，随着微利项目中妇女借用资金能力的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and 参与商讨权得以改善，家庭消费（收入）也相应改观。

3. 采取积极政策措施，纠正资源利用及政治言论方面持续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

因为实现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综合效果往往需要一定时间，中、短期经常要采取积极措施。积极措施旨在纠正社会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排斥的特定方式的具体步骤——无论是在家庭、社区还是在工作地点，这些措施加速了纠正持续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工作的进步，并且对特定的分组人口也十分有用——像社会性别不平等尖锐存在的贫困人群。

既然各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本质和幅度相差甚大，就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干预手段。关于政府是否要进行干预，以及应该采取哪些积极措施的决定应建立在理解和分析地方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积极措施实际上要以资源为代价，所以政策制定者在决定哪些措施应该采取这个问题上要有所选择，应该战略性地以政府干预在哪些方面能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为中心。这就意味着以市场运作效果最差和外流人口现象最为严重的地区为重点，同时也应该注意私营部门不能独立运作或运作较差的地区。

除了评定应该采取哪些特别干预措施以外，还需决定政府应如何准确进行干预。例如，是否应该对物品或公用事业实行直接公共配给；相同目的是否能够通过更大的信息可用性以及调整和实施工作，或通过对私人供给者的公共补贴得以更有效的实现。

政策研究报告针对积极政策中的四个主要方面。

促进生产性资源利用和收入能力的社会性别平等。努力提高利用和支配生产性资源的社会性别平等——不管是教育、财政资源，还是土地——保障对就业机会的公正、平等享用，可以增进社会性别平等，提高经济效率。政策制定者在干预方面有若干潜在的出发

点。

- 降低学费，解决父母对于女童举止端庄和安全的考虑，通过提高学校质量对女性学校教育进行投资来增加对家庭的回报，所有这些都克服女性教育的社会和经济障碍，即使是在高度按性别划分的社会也是如此。
- 制定财政制度，解决针对社会性别的束缚——或是利用同辈压力来代替传统的抵押借款方式，或是通过精简银行办事程序，或是向家庭、市场、工作地点提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能够增强女性对储蓄和贷款的利用。
- 使夫妻共同持有土地或使妇女独立持有土地的土地改革能够在以成文法为主导的情况下增强妇女对土地的支配。如果习惯法和成文法并肩存在，要想使妇女对土地的使用得以增强，就必须考虑两者的相互作用。
- 在有相对发展的劳动力市场和法律实施能力的国家，就业项目的积极措施能够促进妇女参加正式工作。如果在雇佣和晋升方面存在严重的社会性别歧视，积极措施同样能够提高公司以及经济的运作效率。

减少女性为家庭付出的个人代价。在几乎所有社会，社会性别模式表明各年龄阶层女性承担着料理家务、照顾家人的主要责任。在发展中国家，家庭责任常常要求相当长的工作时间，从而使女童不能继续上学，并束缚母亲参与市场工作的能力。几种干预手段能够减少女性为家庭付出的个人代价。

- 提高教育、工资及就业的干预手段——加之对促进健康和计划生育等生产性公用事业的充分利用——都能够增强妇女在再生产性决策中的作用。但是由于男女对家庭人数和避孕工具的使用有不同看法，计划生育工作应该兼顾两者的意见。
- 为儿童托管事业提供公共支持能够减少托管费用，使妇女更好地参与经济，使青少年女性得到更多学校教育。在肯尼亚，儿童托管价格的降低大大促进了母亲的有偿就业和较大年龄女童的学校教育（图 12）。

图12 低费用儿童托管意味着更多妇女就业，更多女童接受学校教育

儿童托管费用下降 10%所带来的肯尼亚母亲就业和 8-16 岁少年儿童入学状况的好转
百分比

母亲就业状况 女童入学状况 男童入学状况

来源：Lokshin、Glinskaya和 Garcia 2000。

- 劳动力市场保护法常常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在正式部门工作的妇女付出代价，一方面又给她们带来好处。例如，如果公司为休产假的妇女承担一切费用，就有可能在雇佣员工的决定上对妇女产生偏见；如果妇女承担这些费用，她们继续工作的动力就有可能减弱。将孕、产妇及其它保育品所需费用分派给雇主、工人，甚至国家，能够使妇女及她们的家庭受益更大。
- 对水、燃料、交通和其它用于节省时间的基础结构的选择性投资能够加速减少各年龄阶层女性的工作量，尤其是那些在贫穷的农村地区的女性——把她们解放出来，让女童接受学校教育，让成年妇女参加与赚取收入有关或是与社区有关的其它活动。

提供与社会性别相应的社会保障。在经济波动和政策改革期间，男女由于社会性别不同而要面临不同的风险。女性占有用以抵御打击的资源较少——而另一方面，男性作为传统上养家糊口的人，在面临由于工作变动或不确定而带来的压力时显得尤为脆弱。在制定社会保障措施时考虑风险及脆弱性方面的社会性别差异十分重要，因为同一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不一定共同遭遇风险。

- 为了共同保护男性和女性，社会保障项目需要考虑导致参与和受益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因素。例如，安全网项目常常（或许出于疏忽）因为没有估计到劳动力供应行为、信息利用、或是男女认为合适的工作种类而将女性排除在外。
- 老龄安全项目由于没有考虑到就业、收入和寿命方面的社会性别差异而冒险使妇女——特别是孀妇——在年老时受到贫困的打击。最近对智利的一项研究显示，相对于男性养老金而言，女性养老金十分容易受老龄安全制度的具体特点的影响（图 13）。

图13 养老金方案影响老年人的相对福利

未完成小学教育的智利男性和女性工人的养老金福利
(括号中为女性对男性的比率)

以千比索为单位

注：这些评估假定男性在65岁退休，女性在60岁退休——男性和女性退休的法定年龄——除非有另外说明。*MPG*代表政府支持的最小养老金保障。数字按照城市居民每月养老金计算，假定工资每稳定增长2%可获利5%。男性在退休（65岁）后可以支撑15年，并可在6年内利用自己养老金的60%为存者预做安排。如果女性在60岁退休，她们可以支撑23年，如果在65岁退休，则可以支撑19年。

来源：Cox-Edwards 2000 节选部分。

增强妇女的政治言论与参与。建立基本权利社会性别平等的制度改革是更平等参与政治、发表政治言论的基础。同样，促进平等接受教育和平等利用信息（包括法律规定的读写能力）的政策和计划能够增强妇女的作用，提高她们的参政能力。但是犹如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样，这些方法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取得显著成果。

最近，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印度、菲律宾、乌干达等在内30多个国家的经验显示，政治“保留”对于在短期内提高地方和国家议会的参与和代表状况十分有效。“保留”法案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形式，但一般都规定了国家和地方议会保留给女性政党候选人或选举席位的最低数额（或最小比例）。

未来的挑战—前进道路

政策研究报告中出示的证据显示了政府进行干预从而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刻不容缓的形势。事实上，国家、社会力量以及国际团体在反对社会性别歧视从而取得显著社会成效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仍然存在几项严重的挑战。

通过社会性别分析调整政策

如何深化理解社会性别平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将这些关系反映到政策决策上是现在和未来的主要挑战。政策研究报告广泛收集了关于这些关系的证据，但是相当一部分还有待于进一步发现和把握。这就意味着有必要收集更多更好的数据，并按照社会性别分类进行分析。有两部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 具体的宏观和部门政策对社会性别的影响是什么？公共事业开支如何促进或抑制社会性别平等和经济效率？政策制定者在财政和行政预算紧缩的情况下面临许多急待解决的对公共资源和公共关注的要求。在这些约束下，信息和分析能够帮助政府从选择的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干预措施中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不仅如此，因为社会性别差异的实质在不同社会有不同表现，强有力的政策应建立在结合地方和国家的社会性别问题的分析中。
- 不仅要看到政策和计划如何影响常规的发展标志（例如，教育、卫生或就业指数），更要看到具体的干预措施如何促进女性的独立、领导能力和发言权——既在家庭也在社会。了解哪种干预措施对此最为有效要求对社会性别作进一步分析。

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与此相关，政策制定者在面临急剧变化的情形时能否高瞻远瞩也是一个挑战。事实上，许多新近出现的问题需要政策制定者和政策研究者从社会性别角度给予更大关注，包括全球化、政府地方分权、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蔓延和世界人口的老齡化。例如：

-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增加，世界人口正趋向老齡化。除了其它结果，还会引起二十一世纪世界范围内妇女数量的大幅度提高。这种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对社会保障、卫生和公共政策的其它方面意味着什么？能否了解这种人口趋势的政策内涵对未来数年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 同样，全球化和新信息革命正在转化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分享信息的方法。这些变革会加速社会性别平等的进程，还是会扩大经济机遇中社会性别的差距？能否更好的理解与这些影响力有关的机遇和风险是对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另一挑战。

扩大合作

第三个严峻挑战是政策制定者——在努力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过程中——能否扩大与民间组织、赞助者和国际团体中其他成员的合作。政策制定者要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反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工作可以通过与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合作得到加强。赞助者可以在协助收集和分析按照社会性别分类的数据中，在将社会性别分析纳入他们与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对话中，以及在借鉴建立于国际经验基础上的“先进实践经验”中作出贡献。同样，民间组织和地方研究人员可以提供以地方经验为基础的关键信息和分析，从而丰富政府的政策对话。

加强更广泛合作、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在总体给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和国家发展带来巨大的回报潜力。妇女更广泛参与公开讨论和政策制定能直接给妇女赋予权利——并能够增强政策和计划的影响，关于妇女对公共事务的更广泛参加和降低腐败程度之间联系的研究结果十分有吸引力。结果显示，促进意见的更广泛交换和政策的更高透明度——使妇女更广泛投身政治领域——可以增强国家的管理职能，提高发展政策的力度。全世界都不能忽视如此显著的有益结果。

注释

1. 图1、8和11中使用的权利指数是Humana (1992)从100多个国家收集来的社会性别权利平等的三个指数的平均值。个体权利指数围绕政治和法律的社会性别平等、社会和经济的性别平等、以及结婚和离婚程序中权利的社会性别平等。指数的建立在几个国家中使用的方法一致，权利幅度（数值范围1-4）的评估比照联合国几项人权措施中指定的权利。

图1、2、3、4、7、8、9、11所包括国家的报告全文参见附录1。图3、8、9、11中隐含回归结果的主要报告附录2。

政策研究报告目录

前言

绪论

政策研究报告制定小组

摘要

权利、资源和言论方面的社会性别平等
虽有进展，但社会性别不平等仍在各国存在
社会性别差距在贫穷人口中趋于最大
社会性别不平等妨害福祉，阻碍发展
社会性别不平等为什么会长期存在？
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三项战略
未来的挑战——前进道路

1. 21世纪伊始的社会性别不平等

定义社会性别平等
权利、资源、言论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区域模式
地区和国家社会性别不平等模式
社会性别和贫困

2. 社会性别不平等阻碍发展

给福祉带来的损害
给生产力和发展带来的损害
给管理带来的损害
社会性别不平等为什么会长期存在：概述
政府在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中的作用

3. 社会规范、法律和经济制度

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中的社会性别

权利和法律

经济制度

制度改革：改革对象是什么？

4. 家庭中的权力、刺激和资源

什么是家庭？

家庭复制社会性别分工模式

资源支配和商讨权影响家庭分配

政策刺激和公共投资影响社会性别结果

5. 经济发展对社会性别平等是否有利？

取消刻板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

进一步鼓励对人力资源的平等投资

通过市场竞争削弱社会性别歧视

社会性别平等进程：宏观研究结果

发展是否导致社会性别平等？区域意见

6. 实施三部分战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

改革制度，为两性建立平等的权利和机遇

加速经济发展，进一步鼓励资源的社会性别平等

采取积极措施，纠正资源利用和政治言论中持续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

未来的挑战—前进道路

附录

附录1 注释和国家数据覆盖

附录2 跨国基本回归模式和协同评估

附录3 比照人力资本差异的两性相对收入

附录4 “单一”家庭模式的经验测试

附录5 教育模式

参考书目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

通过提高权利、资源和言论的社会性别平等

在发展中促进社会性别意识

摘 要

世界银行 • 2000 年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

通过提高权利、资源和言论的社会性别平等

在发展中促进社会性别意识

摘 要

世 界 银 行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2001·6·北京